

## 中国学校的发展图景—辩证的视角

王英杰  
北京师范大学

马健生  
北京师范大学

田京  
北京师范大学

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 中国教育取得了显著成就。在全球化和数字化时代, 中国学校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在对中国学生、教师、家长和校长长达两年的调查研究基础上, 采用混合研究方法, 力求描绘中国学校的现实样态。研究发现, 中国学校充满了活力和冲突, 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教育目的的坚守与异化; 学生成长的快乐与痛苦; 家长的焦灼与期盼; 教师的坚守与解放; 校长的困境与突围。基于此, 中国学校经历了学校组织的进化与变异。学校组织的进化是指设施设备现代化、空间结构时尚化、组织结构集团化、学校功能万能化以及地理分布集聚化。全球化时代, 中国学校在未来发展中期待更为广泛、更加深入的国际合作。

关键词: 中国学校; 教育改革; 辩证法; 冲突; 前景

### 一、导言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近四十年间,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中国的学校[1]经历了巨大变革, 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000年, 中国实现了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目标; 2012年之后, 教育投入达到国民生产总值(GDP)总量的4%。与此同时, 中国学校开展了义务教育阶段课程改革, 不断致力于建设高质量的教师队伍, 推动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开展高考改革, 并加快教育的法制化进程。然而, 由于存在要求严格、学生承受巨大压力、教学方法机械、学习过程刻板、学生缺乏创造力等问题, 中国学校教育一直饱受诟病。中国上海在2010年和2013年两次问鼎经合组织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 该结果在西方国家教育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从辩证的视角看, 中国学校充满了争议, 不仅被冠以高学业成就的美誉, 还因阻碍学生的全面发展而遭到非难。虽然学术界开展了大量关于中国学校的研究, 但对世界而言, 中国学校似乎还披

着一层神秘的面纱，本研究旨在向世界客观呈现中国学校的现实样态。

学校教育一直被认为是提升学生能力甚至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主要方式，并上升为国家的战略重点。对大多数学生而言，获得高质量的教育是取得成功的必经之路，因此，孩子的教育问题也成为中国家长的首要关切。在变幻莫测的国际环境中，中国学校面临着全球化、数字化、新科技革命以及社会变革等多重挑战。2013年，中国提出了“中国梦”的指导思想和执政理念，<sup>[[i]]</sup>通过提升教育质量，将中国建设成人力资源强国的“教育梦”是“中国梦”整体愿景的有机组成部分。

虽然目前已有大量关于中国学校的研究，基于全面描绘中国学校发展图景的目的，该研究运用辩证的视角力图展现中国学校的现实样态。通过混合研究试图回答以下问题：中国的学生、家长、教师和校长的典型日常生活具有什么样的特征？形塑中国学校的因素有哪些？这些因素是如何作用于中国学校改革的？中国学校存在哪些两难困境，这些两难困境是如何产生的？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中国学校未来会走向何方？

## 二、理论框架

本研究运用辩证理论分析并阐释中国学校和教育中复杂而又矛盾的问题。辩证通常指要素之间存在的对立、冲突、矛盾等两难境地。辩证理论是用逻辑推理及因果分析的方法分析一个整体之中各要素的关系，并强调事物多线性和非连续性发展的视角，

<sup>[[ii]]</sup>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和黑格尔的实证主义和当代一般系统理论 (general systems theory)。辩证理论体系具有多个理论分支，其中，强调辩证是现实、统一逻辑和经验观察三位一体的马克思辩证理论应用最为广泛。马克思辩证理论指出，冲突、对抗、反对、协商、困境和矛盾是辩证法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发展在冲突、对抗、反对、协商、困境和矛盾中才得以实现。<sup>[[iii]]</sup>辩证理论是理解社会现象关系和冲突本质的有效视角，常被用于分析知识和权力二者之间的关系。<sup>[[iv]]</sup>

本研究运用辩证理论分析中国学校改革和教育现实二者相互交错的复杂关系。迫于全球竞争的压力，中国政府亟待通过学校改革和教育成功提升国家竞争力。与此同时，学校教育还具有文化、政治、经济等功能，这些功能是主导学校变革的隐形力量，但在实践中常常发生冲突。学校在教育改革中要根据自身的办学条件协调互相冲突的教育要素和理念。

中国奉行“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中国学校中最关键的是学校中的人。该研究从关注学校中的人-学生、家长、教师和校长着手，刻画他们的现实生活。通过对以上四个主体详细、深刻地分析，探求中国学校教育实践中隐藏的冲突。本文也包括对学校组织变革的研究。

## 三、研究方法

基于对中国学校的现实问题和未来发展图景的关切，该研究使用连续的混合研究方法开展了两年多的系统、实证调查。在数据收集和数据分析阶段都采取了结合量化和质性两种方法的混合研究方法。混合研究方法通常用来解答既可以用量化研究方法也可以用质性研究方法解答的问题，<sup>[[v]]</sup>尤其适宜于解答复杂的教育问题。该研究中的混合研究方法的使用具体包括问卷、实地观察、深度访谈和资料分析。

## （一）研究设计

此项研究的目的是通过描绘中国学校的全貌，探寻中国学校中的现实冲突和发展前景。研究采用了可以相互补充并解释不同类型数据的混合研究方法。<sup>[[vii]]</sup>混合研究方法能够更加有效地理解学生、家长、教师、校长对中国学校的真实感受，通过量化和质性数据的互相验证挖掘中国学校实践的理念，探寻其未来的发展图景。

受到约翰·古德莱德的代表作《一个称作学校的地方》的启发，为全面探求中国学校的运行机制和内部冲突，该研究始于生动、真实地刻画中国学校的现实状态的目的，聚焦中国学校的内核——学生、家长、教师和校长展开研究。为了了解外国读者希望看到怎样的中国学校的现实关切，研究者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专业的外籍教师开展了长期、热烈地讨论，外籍教师以旅居者的视角表达了对中国学校研究的期待，并提出了很多研究建议。在现有的研究中，中国学校多呈现出充满激烈的竞争、填鸭式教学、抹杀学生积极性等形象。因此，中国学校留下了“学生生活在巨大的压力之中”、“教师十分严厉”的刻板印象。<sup>[[vii]]</sup>当前，中国学校正经历着巨大的变革，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是时候打破世人对中国学校的固有印象，并全面理解中国学校了。基于此，该研究采用混合研究方法，运用辩证的视角揭示中国学校中显性或隐形的冲突和矛盾。

### 1. 问卷设计

该研究分别为家长、教师和校长设计了三套独立的问卷。由于研究样本量较大，且分布广泛，该研究采用结构化的封闭式问卷。首先，教师部分的问卷主要参照了2013年“教与学的国际调查 (TALIS)”以及2011年“国际数学和科学研究趋势”调查问卷中有关教师问卷的结构和部分问题。课题组结合预研究的研究结果和中国教师的实际状况，开发了《中国学校研究·教师问卷》，该问卷为多因素结构，包括基本信息、教师的教育哲学、教学情况、教师专业发展、教师交流与反馈、教师教研与科研、班主任日常工作7个部分，涵盖单选题、多选题、填空题共37个题目。其次，《中国学校教育·家长问卷》共设计了22个选项，其内容涉及五类主要的社交任务情境，包括家长的基本信息、家长对子女的期望值、家长择校问题、家长与影子教育、家校合作、家长教育参与程度等六个方面的内容。第三，《中国学校教育·校长问卷》共设计了30个选项，包括单选题、多选题、简答题与排序题，内容涉及校长遴选与聘任、校长教育理念与实践、学校改进、工作时间与压力、学校资源和荣誉等八个方面。以上三套问卷能够真实、全面地收集不同主体对中国学校的感受和观点。

### 2. 访谈设计

访谈能够使得研究对象讨论并阐释他们生活的世界，表达受访者对自身处境的真实看法。访谈不仅局限于收集生活中的数据，访谈本身就是生活。<sup>[[viii]]</sup>访谈法是描述中国学校样态及解释其背后机理必不可少的收集数据方式。访谈提纲有多种形式、多种用途，是决定数据质量的关键要素。<sup>[[ix]]</sup>该研究的访谈提纲由比较教育学和教育管理学的教授、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组成的研究团队共同开发而成。主要的问题包括：第一，学生一天的生活，集体认同感培养和高考体验；第二，班主任的工作日常，教师形象和教师的自我认同，教师对教研和科研的看法和看法；第三，家长的一天，教育哲学，家长的择校体验；第四，校长的角色和日常工作，校长的遴选，优秀校长的创新型领导。以上访谈提纲在通过对5名学生和3名家长的预研究之后作了修正和调整。

正式访谈为深度的半结构式访谈，包括一对一对面访谈、焦点小组访谈和在线访谈多种形式。与问卷调查的设计相似，访谈提纲也包括教师、学生、家长和校长四个独立的访谈提纲。

## （二）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访谈对象为中国学校中的成员等利益相关者，他们是表达对中国学校教育感受的最核心的群体。研究样本的选择依据理论抽样的原则，数据收集结合调查的实际情况展开。问卷调查收集到了来自全国23个省、5个自治区、4个直辖市，包括896名教师、2930名家长、440名校长在内的共4266份有效问卷。访谈对象的选择最大可能地考虑到研究对象的个性、人口统计学变量和社会结构的差异。

在896位接受调查的教师中，正式教师、临聘教师和代课教师的比例分别占94.8%、3.1%和2.1%。76.3%的教师教授语文、数学和英语三门主科。小学、初中和高中教师的比例分别占样本总数的79.7%、13.5%和6.8%。参与研究的2930名家长中，26.9%的父亲和26.6%的母亲接受过高等教育，24.7%的父亲和19.8%的母亲职业为私营企业主，在家长职业分布中所占比重最高。440名校长中，65%的校长年龄在40-50之间，41.1%的校长任职不足5年，81.1%的校长学历为大学本科，大部分校长为城镇或农村校长，所占比例为57.3%，公立学校的校长占96.1%。

考虑到样本的典型性和代表性，该研究分别选取14名校长、38名教师、28名学生和27名家长开展深度访谈。以上访谈对象分布于城市和农村地区的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包括小学、初中和高中三个年龄段。其中，为了了解学生的高考体验，本研究还选取了3名大学一年级新生作为研究对象。

## （三）数据收集

### 1. 第一阶段：问卷

本研究的问卷数据收集工作在2015年9月到2016年3月期间完成。随着互联网在科学研究应用中的普及以及网络在线数据收集的便捷性，在线数据收集成为了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非常重要的数据收集方式。<sup>[[x]]</sup>由于访谈对象分布广泛，本研究采用在线数据问卷数据发放和收集方法。数据收集通过中国极为受欢迎且使用较为普遍的大众化的社交平台“微信”展开，《中国教育报》公共微信号为该研究打造了一个全新的以问卷为载体的信息沟通平台，受访对象可以通过微信直接填答并提交问卷。《中国教育报》具有100万粘性很高的读者群体，大部分是在中小学工作的教师，他们多是关注中国学校的核心群体。该数据收集方法确保了数据的真实性、权威性和有效性。

### 2. 第二阶段：访谈

访谈能够直接观察到访谈对象的行为、洞察其感受以及他们对世界的看法。<sup>[[xi]]</sup>基于研究问题和访谈提纲，本研究对包括28名学生、36名教师、27名家长和14名校长在内的108名研究对象开半结构式深度访谈，并在2015年3月至2016年2月间完成访谈数据收集，转录访谈资料脚本26.2万余字。此外，本研究对北京市中小学学生开展了由5-7人组成的焦点小组访谈，根据访谈提纲鼓励焦点小组访谈成员自由表达、讨论各自的观

点。由于研究对象地域分布广泛, 相比于面对面访谈, 一些访谈对象更倾向于在线访谈。本研究的教师访谈就包括对河南省、山东省、安徽省等多个省份教师的电话访谈。在征得获取访谈对象的同意后, 本研究达成了口头或书面知情同意, 为保证访谈数据的完整性和正确性, 本研究在获得研究对象同意后对开展了访谈录音。从阐释访谈目的开始, 每一次访谈时长为30-60分钟不等。为确保访谈数据的保密性, 所有访谈均经得访谈对象和研究者双方同意, 并将所有的个人信息做匿名处理。

### 3. 第三阶段: 实地观察

观察是在真实条件下获取研究对象对世界认知的更加可行的方法。<sup>[[xiii]]</sup>研究者置身于研究的物理环境中, 能够近距离接触研究物理环境中的设施、设备, 研究对象的活动和日常活动。本研究中, 实地观察的方法有利于研究者以局外人的身份更大程度地洞察中国学校的矛盾和冲突。为了更加深入地理解研究对象对研究问题的观点, 本研究采取实地非参与式观察法, 从2015年9月到2016年2月, 研究者在历时6个月的时间中深入北京、上海、重庆、浙江、吉林等11个省份的学校、教室、家庭、校长办公室等教育现场, 并通过学校会议、教师会议、教师研讨会等活动开展非参与式观察。在观察的同时, 研究者做了详细的观察笔记, 记录中国学校教育中的活动以及教师、学生、家长和校长的行为。

#### (四) 数据分析

为更加全面、准确地以研究对象的视角描绘中国学校的现状, 并发现中国学校存在的问题, 本研究运用 Excel和SPSS 18.0数据分析软件进行数据分析。数据分析软件结合了数据和语言分析的优势, 在数据分析过程中建立了数据之间系统联系的网络, 并为分析多频次数据提供了可能。<sup>[[xiii]]</sup>首先, 描述性数据主要包括教师的群体特征、教师对学校教育的态度; 家长群体的特征、家长的教育哲学、家长对择校和学校教育的看法; 校长群体的特征、校长如何管理学校以及对学校改革的态度。其次, 在以上研究发现的基础上, 本研究运用相关统计分析方法开展了教师专业发展与教师效能的关系、校长的时间管理和学校改革之间的相关关系分析。

质性研究数据(访谈、现场观察和资料收集)旨在通过研究对象的真实体验, 从研究对象的视角获取对中国学校的看法。研究首先逐字逐句转录访谈内容, 借用N-Vivo 8.0分析软件, 采用内容分析法分析研究数据。为更加深刻、清晰地开展数据挖掘, 数据分析采用开放编码和主题编码二级编码方式。

开放编码是数据分析的第一阶段, 主要基于重复出现的和相似的主题对近26.2万字的质性材料开展初级编码, 在此基础上运用主题编码的方式开展类属分析。由于质性材料具有反复性和重复性等特点, 需要不断地提炼编码主题, 并反复思考研究问题。<sup>[[xiv]]</sup>主题编码通过反复阅读原始数据提炼主题词, 重复率比较高的数据是主题编码的重点。<sup>[[xv]]</sup>主题编码的过程中能够不断提炼出比一级类属更为详细的类属概念, 在此研究中表现为教育目的、学生的就读体验、家长对学校的态度、教师的坚守、校长的困境以及学校组织的进化等。

该研究采用对不同的个案采取主题编码分析,<sup>[[xvi]]</sup>以求更清晰地探讨不同研究对象对同一个问题的看法和感受之间的对比、差异以及相似之处。有时候研究对象的回应并不能与研究问题贴合, 该研究尽可能通过对数据开展深度、有条理地分析, 进而全面

挖掘研究对象对待特定问题的观点和感受。

### （五）数据有效性和准确性

通过从不同的视角，以不同的方式开展三角互证，是开展研究结果有效性验证的主要方法。<sup>[[xviii]]</sup>多维度混合研究方法所搜集的数据为开展数据之间的三角互证提供了可能，该研究也采用三角互证的方法确保研究数据和研究结论的准确性和有效性。首先，本研究的研究团队由20多名专业的教育研究者组成，其中三名教授在研究中发挥了主要作用。研究团队成员之间的同行核检、成员检验、研究记录等都是开展数据有效性和真实性验证的有效方式。<sup>[[xviii]]</sup>另一方面，研究团队通过连续数据分析开展数据三角互证。通过对原始数据分析的校验，本研究对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数据进行了对比分析，对出现的主题进行验证，及时更正错误信息，并采取对比和确认的方式保证后续研究的顺利进行。<sup>[[xix]]</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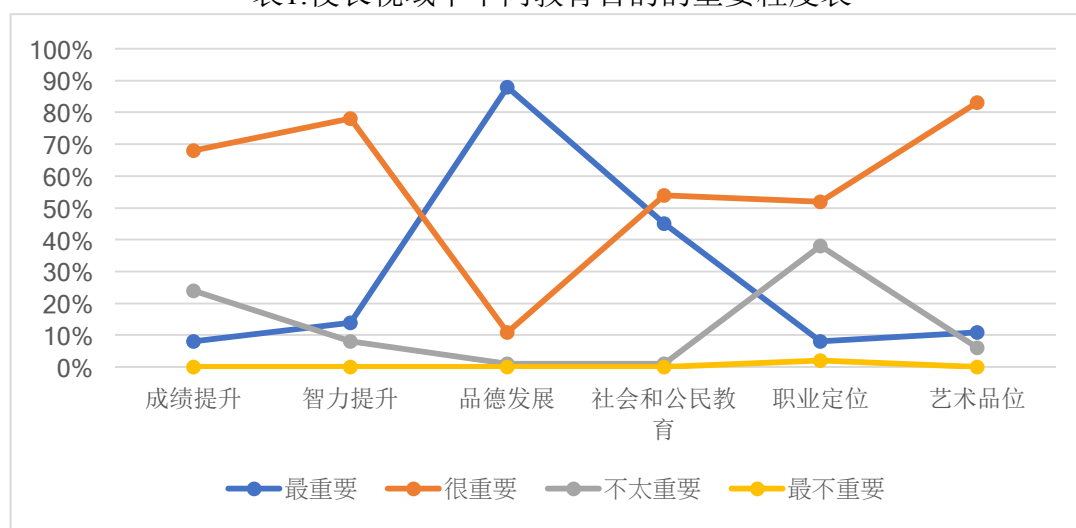
## 四、研究发现和讨论

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得出了与中国学校密切相关的五个重要研究发现，揭示了中国学校充满冲突的特点，这些冲突是理解学校主体与中国教育抗争的有力工具。

### （一）教育目的的坚守和异化

教育目的主导教育过程，是评价教育过程的标准。与古代西方国家相似，两千多年以来，传统的中国教育关注学生的道德教育，强调个人修为和对真善美的追求。随后西方国家教育目的的设定对中国教育目的的重新定位产生了巨大影响。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迫于内外部双重压力，中国学校的教育目标一方面坚守传统，另一方面又迎接变革。研究数据表明，很多校长将学生的道德教育和智力教育作为主要的教育目标，多达88%的校长认为学生的道德发展是最主要的教育目标，只有8%的校长认为学生的学业成绩是最重要的（表1）。

表1.校长视域中不同教育目的的重要程度表



#### 1. 社会化与个性化

自古以来，教育目的就与政治和社会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古代的教育是精英阶

层的特权，教育的目标是为国家培养官员，正如孔子所言：学而优则仕。然而，教育观念和教育过程是随着历史的变化而变化的，同时也具有情景性、政治性、规范性、争议性的特征。<sup>[[xx]]</sup>在当代社会，教育应该满足不同学习者的学习需求。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是当前中国教育的主要目标。教育目标的社会化与个性化之间的冲突是中国学校存在的最显著的冲突之一。

新中国成立以来，结合中国的教育传统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观，中国设立了社会主义教育目标。<sup>[[xxi]]</sup>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 (Durkheim) 曾指出教育的首要目的是促进学生的社会化，强调社会化中社会建构、社会制定和社会监督的功能。<sup>[[xxii]]</sup>促进学生社会化也是中国学校最重要的教育目标之一，主要通过学生的集体认同感培养来实现，例如，每周举行升旗仪式；运用校训、校徽、校歌、校服等身份符号设置集体边界；捍卫本集体的发言权；通过成员的自我激励和团队建设开展集体区分。<sup>[[xxiii]]</sup>

然而，对于学生而言，学习如何在集体中生活是否比学习知识更为重要？现代社会要求学校教育更加强调学习者的个性，学校教育在学生社会化和培养学生的个性之间出现了矛盾。为了促进学生个性化成长，中国学校开展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例如拓展学生的学习和生活等各个方面的能力；促进人才培养方式多样化；结合学生发展个性设置大量中小学学生社团；设置多样化的课程；开展家校活动；班主任对学生开展家访和心理指导；任课教师备课时考虑学生的学习特点等。

## 2. 全面发展和核心素养

教育目的需要服务于提升学生能力、促进学生全面发展。20世纪中叶，中国学校提出教育的目标是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2000年，中国出台《义务教育法》，指出教育要与劳动相结合，劳育成为了学校教育目的的第五个维度。中国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方面做出了很多努力和尝试，旨在将学生培养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身体健康的人。<sup>[[xxiv]]</sup>

全面发展的理念引导学校将学生培养成身心和谐发展的人。社会的发展和全球化时代给学生提出了更高的挑战。20世纪末，美国和国际组织，如欧盟、经合组织等为迎合社会发展和经济变迁的需求，提出了“21世纪技能”的培养理念。受此影响，为顺应时代发展和全球竞争对人才提出的新要求，中国提出“核心素养”的教育理念，旨在支持个人成长，提高学生的工作能力，促进学生社会化。<sup>[[xxv]]</sup>2015年起，在借鉴国际课程改革的基础上，中国政府将“核心素养”作为课程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核心素养的本质是面向21世纪，培养学生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包括协作、交往、创造性、批判性思维四大素养。核心技能客观上要求学校采取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法，基于真实的问题拓展国际合作能力。<sup>[[xxvi]]</sup>2016年，中国提出了一个结构完整的核心素养框架（表2），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为核心，分为文化基础、自主发展、社会参与三个方面，将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引领中国学校教育的变革。

表2.中国教育的核心素养框架

中国教育的核心素养框架		
	自主发展	学会学习
		健康生活

全面发展的人	社会参与	责任担当
		实践创新
	文化基础	人文底蕴
		科学精神

资料来源：核心素养研究课题组.中国学生发展的核心素养[J].中国教育学刊, 2016(10):1

### 3. 传承和创新

中国教育具有悠久的历史，积累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中国社会十分关注教育问题。学校教育在传承文化，促进知识创新方面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字面上看，传承和创新是相互抵触的，中国学校在文化传承和教育创新方面陷入了矛盾的境地。

教育活动中的教师、学生乃至家长都扮演了文化传承的角色，随着中国社会对传统文化的重视，中国学校也将传统的儒家思想和道德教育融入到课程中。教育部提出教育应“回归”传统，很多学校出现了“国学热”，例如，很多小学要求学生背诵《论语》、《弟子规》等国学经典，并要求学生练习书法。然而，中国的传统文化不鼓励创新，例如俗语有言：“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诸如以上理念极大地抑制了创新。人们常常批评中国的传统文化教育学生顺服，抹杀学生的想象力，印证了中国传统教育缺乏鼓励学生创新的机制。<sup>[[xxvii]]</sup>

社会对于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呼声越来越高，科技创新对学校培养创新型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学校陷入了传统的儒家文化和新时代教育理念相互交织的两难困境中。21世纪初期，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先生提出“为什么中国教育培养不出创新型人才”的疑问再次触发了人们对于创新型人才培养的讨论。中国学校也越来越重视在实践中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采取了完善课程设置、创建自由的课堂学习氛围等措施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

### 4. 大众教育和精英教育

大众教育泛指为大多数人服务的教育。<sup>[[xxviii]]</sup>20世纪后期，中国学校的小学 and 中学教育规模迅速扩大，并实现了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目标，教育大众化也成为了教育现代化的主要特征。据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小学的净入学率达到了99.88%，初中和高中的毛入学率分别达到了104%和87%。<sup>[[xxix]]</sup>然而，伴随着教育大众化，“多意味着质量差”的争论随之而来。<sup>[[xxx]]</sup>大多数情况下，大众教育被认为是出于维护社会公平的目的而开展低质量教育的代名词。

随着中国大众教育的普及化，大众教育质量远低于精英教育的质量，人们对高质量精英教育的需求越来越大。基于此，中国学校始终坚持大众教育的指导方针，不断扩大教育供给，适当提供精英教育，满足受教育者的需求，培育高质量拔尖人才。以上措施是为了确保所有的学生，而非少数精英阶层的学生能够有机会获得高质量的教育。

### 5. 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

自一千年多前设立了考试制度，中国教育就逐渐形成了应试教育的传统，<sup>[[xxxi]]</sup>对考试的重视深深地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中。<sup>[[xxxii]]</sup>20世纪90年代之前，应试教育在教育中占



据主导地位, 中国教育形成了为迎合考试需求而只关注机械背诵的教育模式。应试教育唯分数至上, 被指责为扼杀学生个性、有悖学生的全面发展。与此同时, 应试制度由于通过考试选拔优秀学生而达到维护社会公平、促进社会阶层流动的社会功能在中国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应试教育采用严格的标准考试, 鼓励死记硬背而非关注学生的学习经验和高阶思维能力。在激烈考试竞争的压力下, 学生难以实现全面发展。为把中国建设成为人力资源强国, 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提出了“素质教育”的教育理念, 即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 激励每个学生在成长中发挥个人主动性。<sup>[[xxxiii]]</sup> 素质教育源自把学生作为教育的主体, 并通过教育促进每个学生成长的教育理念, 中国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促进素质教育理念的实施。其中, 教育部于2001年出台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是落实素质教育最为重要的政策文本。此后, 中国学校的教育改革围绕新课程改革, 实施素质教育, 增设了大量基于活动的课程以及课外活动。更为重要的是, 考试制度的重点从关注学生选拔和精英主义转为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以上实践表明, 中国教育改革正在逐步打破应试教育的枷锁, 不断迈向素质教育。<sup>[[xxxiv]]</sup>

“健康的关乎人成长的教育才是真正的‘素质教育’”。

——一位受访校长

## (二) 学生成长的快乐与痛苦

中国学生的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学校中度过的, 通过学校教育学习知识, 结交朋友, 并促进自己社会化。学校是学生成长的地方, 对学生而言, 学校生活既是多彩的万花筒, 充满游戏、好奇和学习兴趣; 学校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又是一种炼狱, 尤其是当经历考试、竞争和规训的时候。学校中激烈的竞争以及家长对学生的高期待将中国学生放置于矛盾的境地, 学生在学校生活中经历了快乐和痛苦。

### 1. 难以承受的压力

长久以来, 中国依赖于考试决定个人成就和社会地位, 学校生活充斥了各种各样的考试, 学生为应付考试而生活在焦虑之中。尤其是高考为学生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甚至影响学生的身心健康。在考试为中心的文化中, 考试成绩决定了一切, 学校也因为学生带来的巨大考试压力而被称为“考试地狱”。

学生要认真备考才能在考试中取得好成绩。通常情况下, 学生的学业成绩不仅是衡量一所学校办学质量的高低的主要指标, 也是决定教师奖惩的主要依据。初中生每天平均上课时间为8小时, 学校课程结束之后还要参加一些课外辅导学习, 无论是周末还是节假日, 学生都有沉重的学习负担。大量的家庭作业挤压了学生的休息时间, 对于即将参加高考的高中生而言, 学习时间更加紧张。中国学生不得不承受学业考试、升学和择校等巨大压力。激励的竞争不利于同学之间建立友谊。对大多数中国学生而言, 在学校中表现不好, 成绩差会让父母十分失望, 因为他们承载了整个家庭的所有希望, “好成绩”变成了沉重的道德负担。

“‘三天一小考, 五天一大考’, 这种状态让我已经没有时间去思考考试的意义, 只希望一次又一次的考试能让自己的成绩稳步提升, 顺利通过未来高考的那座独木桥, 迎来人生的巅峰。”

## ——一名受访高中生

### 2. 校外诱惑的痛苦

中国教育取得成功的最主要原因是学生在学习中投入了大量的时间，高强度的课堂学习是确保学生取得良好考试成绩的主要途径。学生要专心致志的投入到学习中，导致休息时间被大大地压缩。学生每天都沉浸在学习中，常被隔离于社会生活之外。为了使学生专心于学习，无论教师还是家长均会限制学生对电脑、手机等电子产品的使用，甚至将学生局限在学校之内，困于书本之中。由于严格管理，电脑、电视、手机等电子娱乐设备成为了学生校外的诱惑。游戏是儿童的天性，对于缺少玩伴的儿童而言，电子游戏是最好的伙伴。但是在中国，大多数情况下，没有父母的允许，学生不可以使用电子设备进行娱乐消遣。很多报道显示，一些青少年由于长期沉迷于网络而荒废了学业，严重损害身心健康，并导致他们误入歧途。

### 3. 合作竞争的魅力

中国学校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是在课堂教学和课外活动中都采取将合作与竞争结合的方式。团队合作有利于培养团队精神，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在国际化社会中，与他人的合作也是必备的技能之一。新课改之后，学校采用大量团队合作学习的教学方式。很多学生是没有兄弟姐妹的独生子女，成长环境孤独，入学之后能够与同龄人建立友谊，并能够愉快地与同学合作。合作也能够帮助学生克服害羞和胆怯，变得更加勇敢。然而，中国学生常常在很多方面与同伴竞争，例如学校排名、考试成绩甚至兴趣爱好等等，其中学业竞争最为激烈，学生为有限的教育资源和更好的受教育机会而竞争。竞争能够强化学生的学习动机，激发学习潜能，大多数情况下，合作与竞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实际上，适度的压力和有趣的合作活动是激发学生不断进步的两股力量。

“我之所以当班干部，就是希望能够锻炼自己的能力，以后找工作的时候也有竞争力。”

——一位受访初中生

### 4. 多彩活动的快乐

2010年中国出台了《教育中长期改革发展纲要（2010-2020）》，强调要通过增加课外活动，减少家庭作业等方式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学校根据学生的认知规律设置了大量丰富多彩的活动，例如体育节、艺术节等等。家长也相信课外活动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学生的竞争力。中国学校增设的大量课外活动表明，中国教育在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的过程中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和尝试，越来越关注学生的生活和学习过程。学生在从事组织、计划、协调等工作的过程中也能不断提升领导能力。多彩的活动本身应该是快乐的，但是当成为学生竞争的工具时，对学生而言却是痛苦。学生感受到更多的是困惑、无助、失望、压力而非好奇、兴趣、快乐和享受。

### 5. 梦想实现的幸福

高考对中国基础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高考是高风险考试，一定程度上决定学生的命运。1999年之后，中国高等教育实施大规模扩招政策，大大提高了高等教育入学率，然而，通过高考进入重点高校学习仍是很多中国学生的梦想。学生将学习视为实现梦想的最佳途径。高考的竞争在小学阶段就已经开始了，学生被重点高校录取被视为成功的主要方式，同时也会为学校和家长带来声誉。如果学生在高考中表现较好并

被重点大学录取, 对学生而言是经历了12年苦读之后的梦想成真。从更长远的视角来看, 经历过高考的淬炼, 中国学生所收获的不仅仅是知识、技能, 这份经历还能增强他们的心理素质和抗压能力, 为他们日后的成长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另一方面, 高考也给学生带来了痛苦。中国学生从小就被灌输要为未来的成功忍受痛苦, 正如中国俗语所言“吃得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中国学生束缚自己, 迫使自己专著于学习满足父母的期望。而高考的成功则被认为是漫长学习生涯中最重要的成功。然而以分数为最终评价指标的高考忽略了学生的身心发展。学生承载了家庭的梦想, 有些学生落榜后会造成长身痛苦与心理扭曲, 高考过后产生人生迷茫, 很多学生进入大学学习后, 往往缺乏独立生活能力。

### (三) 家长的焦灼与期盼

很多中国家庭只有一个孩子, 家长为了学生可以牺牲一切。然而, 家长在全心全意为孩子付出的同时也对孩子提出了很多要求, 尤其重视孩子要通过努力学习获得好成绩, 确保在未来过上成功的生活。以爱之名, 中国家长对孩子严格要求, 不仅事无巨细地照顾孩子的生活, 包办学习之外的所有事情。中国年轻一代的学生生活在父母理性或非理性选择的斗争中。<sup>[[xxxv]]</sup>

#### 1. 望子成龙的焦虑

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助于理解中国家长的教育哲学, 中国传统教育哲学期待孩子过上幸福的生活。家长都希望孩子成功, “望子成龙, 望女成凤”是大多数中国家长的教育信条。<sup>[[xxxvii]]</sup>考虑到未来社会激烈的竞争, 家长对孩子的高期待远远超过孩子的自我期待, 有时甚至与社会脱节, 有时甚至是非理性的乌托邦式的期待。

一项对中国小学生家长的调查发现, 文化程度在“初中”及“中专”水平的家长中, 有60.9%的家长对自己孩子受教育程度的期待为“大学本科”以及“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且希望自己的孩子“学历越高越好”。<sup>[[xxxviii]]</sup>从中国家长的角度来看, 良好的教育能够确保孩子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而被视为孩子的救命稻草。无论贫穷与否, 只要努力学习就能取得成功。中国家长对孩子采取高标准、严要求的教育方式, 同时还要求孩子要顺从父母的想法并用功学习。

#### 2. 颐指气使的批评

中国家长视孩子为珍宝, 希望孩子方方面面都表现优秀, 家长尤其看重学生有优秀的考试成绩。经历一系列教育改革之后, 中国学校承担了太多理想化的教育期待, 如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保证高质量的教学并使教学社会化等。中国学校往往由于不能满足家长不切实际的期待而遭受批评和质疑。该项调查显示, 8%的家长并不认为教师很有能力而且非常具有奉献精神。为把孩子培养成成功的人, 中国家长对学校提出了很多要求, 由于对学校 and 教师总是充满诸多不信任, 他们给学校教育施加了巨大的压力。

可以肯定的是, 大部分中国家长十分认可学校教育在学生成长中发挥的积极作用, 坚信学校教育能够给孩子自身发展和职业准备以良好的回报。然而, 中国家长在教育问题上不相信任何人, 8%的家长强烈反对或不认同“学校在教育孩子方面做的很好”。为了提高教育质量, 中国家长对学校 and 教师提出了大量批评意见。家长任意“插手”学校教育, 常常对学校 and 教师“指手画脚”, 把一切“妨碍”孩子学习的事

情都视为敌人。触及到孩子的学习问题，家长常常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宣示自己对孩子教育的绝对主导权。中国学校承载了太多来自对孩子要求严格的父母所带来额外的负担。学校开始不断扩大家校合作，为家长提供一个表达自己观点，贡献自己力量的平台以提高学校教育质量。然而，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中国家长往往具有自己的计划，并将他人视为竞争者，他们最关心的莫过于自己的孩子比别的孩子更加优秀，因此，中国家长往往被动参与家校合作活动。

### 3. 自我迷失的生活

儒家思想对中国父母的教养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文化十分重视孩子，并要求注重培养孩子的孝道，<sup>[[xxxviii]]</sup>甚至将“为了孩子放弃一切”视为美德，孩子成为生活的全部。

孩子的教育问题是中国家庭的头等大事，教育问题也因此而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很多人将孩子的学业成绩作为衡量家长成功与否的标杆，家长对孩子学习的关注和参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们替孩子包揽了学业以外的所有事情，“包办”孩子的衣食起居。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家长也会在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挣扎，他们把孩子当作整个家庭的中心，家长帮孩子处理从生活琐事到关涉到孩子前途的一切事务，甚至帮助孩子选择兴趣爱好、填报志愿等等。大多数家长会为孩子的教育花费自己大量的精力、时间和金钱，尽自己最大的可能为孩子提供最好的成长环境。参与此次调查的所有2930名家长都表示自己每天都会帮孩子检查家庭作业。孩子的未来是家长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中国家长沦为孩子的附庸，有时甚至到了溺爱孩子的地步。

### 4. 竭尽所能的支持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孩子的教育不仅是中国家长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生活意义的全部寄托。中国家长非常重视父母的教育责任，注重“家风”的塑造，例如，以德立家、以德治家、文化兴家、读书树人、书香传家等，通过言传身教影响孩子。在以“亲子关系”为中心的中国家庭中，孩子常被视为家中的“小皇帝”，子女的成长及其所取得的成就与社会地位与整个家庭休戚相关。中国父母对孩子的付出与他们对孩子的期待成正比，非常严格地督促孩子学习，以便孩子能够赢在起跑线上，孩子从小就被训练成为了学习机器。

为增强孩子在学校和人才市场上的竞争力，中国家长采取聘任私人补习等多种措施促进孩子全面发展。养育孩子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经济成本，中国家长竭尽所能地支持孩子学习。为了保证孩子取得良好的考试成绩并成长为多才多艺的人，很多家长将孩子送到补习班学习数学、英语、艺术、音乐等课程。中国家庭每个月对孩子课外补习班的花费为1000元到5000元不等。此次调查数据显示，75%的家长每个月在每个孩子课外补习中花费1000-2000元，每个月的花费达到2000-3000元，3000-4000元以及4000元以上的家庭分别占16%，5%和4%。家长对孩子毫无保留的付出不利于孩子的独立发展，孩子在成长过程中过分依赖父母，成为学习机器，甚至成长为“巨婴”（指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成年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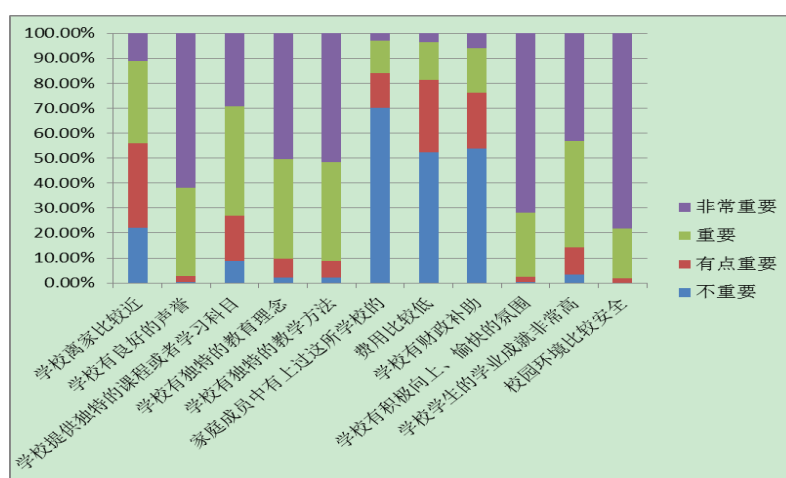
### 5. 派位下的选择

中国的教育政策关注教育公平和教育均衡发展，为此，中国政府制订了一系列禁止择校的政策。然而，中国家长对精英教育的需求有增无减。得到政府大力支持的“重点

校”由于具有较好的声誉而备受追捧。在中国,“重点校”被视为精英学校,教育资源是普通学校的两倍甚至更多,中国只有4%的中学生(大部分在城市)能够进入“重点校”学习。<sup>[[xxxix]]</sup>大量研究表明,家庭的社会资本与孩子的学业成就密切相关,教育是积累社会资本最重要的途径,社会资本也是获得良好教育的保障。择校也不例外,富裕家庭有能力让孩子进入好学校学习,“重点校”中70%的学生来自父母为社会精英的高收入家庭。<sup>[[x]]</sup>

由于拥有丰富的教育资源和大量高质量的教师,“重点校”得到了家长的广泛赞誉和热烈追捧,中国家长陷入激烈的择校竞争中。择校包括以钱择校、以关系择校、以成绩择校等多种方式,其中最普遍的是通过高价购买学区房的方式。例如,家长在孩子就读期间居住在学区房,孩子毕业之后再将学区房转卖给有需要的家庭。<sup>[[xii]]</sup>

表3. 家长择校的影响因素



#### (四) 教师的坚守与解放

中国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教师,支撑了世界上体量最为庞大的教育系统。中国义务教育阶段的全职教师数量超过9百万,<sup>[[xlii]]</sup>他们承担着授课、班级管理、专业发展、实施教育改革等任务。教师是学校教育主要实践者,建设高质量的教师队伍是学校改革的首要目标。

##### 1. 师德的坚守

长久以来,中国的教师被视为“圣人”,教育被奉为“圣职”。古代中国,只有官宦家庭和富裕家庭的孩子才有机会接受教育,知识渊博,道德高尚的人才能成为教师。《论语》用“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描绘教师的形象。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教师是德才兼备的万世之师。中国教师是外表清俊雅致、内心坚定且知识渊博的士人形象。师德是衡量教师是否称职的最重要的指标。即便在当代,师德也是教育政策的核心关注点,例如,最新的教师评价晋升制度尤其关注师德。

##### 2. 教学的精进

教育不仅是一项技能,也是一种艺术。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客观上要求教师要提升教学技能。应试教育阶段,学校教育以考试为中心,教育活动也围绕学生如何能取得高分而展开,教学方法以单向的讲授法为主。近年来,中国的教育和课程改

革要求学生在课堂上开展有效学习，而非机械地听讲，背诵知识点。<sup>[[xliii]]</sup>新课程改革也强调重视学生的生活经验、技能、个人学习兴趣和需求，而非一味关注复杂、生涩、学业导向的老旧课程。大量教育政策都要求课程改革向学习者中心的教学方式转变。教学应该将培养学生的价值观和学习能力融合在一起，采用激发学生主动参与的教学法势在必行。

在中国，教师是很受欢迎的职业，教师的入职标准不断提高，从根源上保证了教师队伍的质量。初任教师通过参加入职培训提升教学技能，同时也是教师在职专业发展的开端。提升教学技能贯穿教师整个职业生涯的始终，除职前教育之外，中国教师有大量参与专业发展活动的机会，其中，教师的教研和科研是以校为本的教师持续专业发展的主要形式。严格的晋升评价制度也督促教师通过专业发展活动提升教学技能。以解决教育实践问题的教研活动也是提升教师教育技能的重要途径。教研活动主要包括教学研讨、主题式教研活动、集体备课、教学竞赛等，每个教师每周的校本教研时间至少为两个小时。此外，通过研究解决实践难题的教师科研也提升了教师的教学技能，由于科研能够提升教师教学质量，并能为学校带来声誉，学校十分支持教师开展教学科研。

### 3. 教师的奉献

由于中国教师具有全心全意、无私地将自己贡献于教育事业的奉献精神而常常被比作蜡烛、春蚕、阶梯等。教师是教育的主要力量，需要承担多种角色，其中，班主任承担的角色更为复杂，除教学外，班主任还要负责管理学生的日常生活。中国学校从一年级到十二年级的每个行政班都配备一名班主任，班主任的任务主要包括：督促学生课业学习、促进学生健康发展、组织学生开展多彩活动、开展班级建设、协调生-家-校三方的关系、参与学校管理事务等。通常情况下，教师从早上7:30入校起就开始了忙碌的一天生活，工作日中几乎每天都要加班至晚上10:00。此次调查数据显示，86%的教师工作日中每天的工作时间超过8个小时。为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教师几乎把自己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在了学生身上。

### 4. 生命的解放

当代中国教师承受着不可承受之重的工作压力，他们在解放学生的同时，自己往往背负着沉重的道德十字架，迷失了自己为身为子女和父母的使命。中国教师期待在工作时间、社会角色中获得解放，也期待自我解放，以便能够更全面地承担社会角色，能够过一种完整的人的生活。此项研究通过开展教师形象的研究了解中国教师的社会角色。表4通过教师的传统形象与教师自我认知的形象之间的对比力求呈现教师形象的全貌。从表中可以看出，社会中教师的形象与教师自我认知的形象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前者是社会对教师无私奉献的期待，后者则展现了教师的个性和实践理念。可以看出，教师职业正逐渐从“圣职”转变为普普通通的职业。

表4.中国社会中的教师形象

	师表	师道	师职
传统的教师形象	德才兼备的高尚	师道尊严的权	无私奉献的圣

	形象	威形象	职形象
教师视域中的形象	独特个体组成的 和谐群体	学生成长的指 南针	一份普普通通 的职业

### （五）校长的困境与突围

中国学校正经历着剧烈的变革，学生、家长和教师都处在巨大的变革张力之中，校长也不例外。大多数校长在职业发展前期都是教师，由于卓越的教学和领导才能而被选为校长。与教师相似，校长也被看作是道德的楷模，他们对学校管理和教学改革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是学校的灵魂人物。校长每天都忙于处理学校事务，当问道“对自己目前的工作表现是否满意”时，分别有29%和43%的校长表示对自己的工作完全满意或部分满意。

#### 1. 无限的责任

中国学校实行“校长负责制”，校长是学校的代表，负责处理学校的日常教学科研活动，完善学校的管理，现有研究表明，校长是决定学校发展和学生学业成绩的关键因素。大部分校长都有做教师、助理校长、教育管理者的经验，<sup>[[xlv]]</sup>很多情况下，校长不仅仅是行政领导者，还扮演了多重社会角色，例如，公众人物、学者、社会工作者、教育家等。除此之外，校长集学校发展规划、行政、教学、公共关系等各种事务于一身。最差的校长是课程最多的校长，<sup>[[xlv]]</sup>为促进校长专业化，2013年，教育部颁发《义务教育学校校长专业标准》，该文件对专业标准的基本内容的阐释则包括六方面的内容，分别是：规划学校发展、营造育人文化、领导课程教学、引领教师发展、优化内部管理、调试内外部环境。<sup>[[xlvii]]</sup>

#### 2. 实干的能力

校长的领导力是教育政策实施的关键影响因素，校长的工作环境变得越来越复杂，尤其是素质教育要求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对校长的能力提出了巨大的挑战。随着教育改革重心下移，中国校长有了更多的自主权，对于一个优秀的校长而言，自主权应与能力相辅相成。随着校长角色的多样化，校长需要具备更多能力才能胜任工作。首先，卓越的教学能力和管理能力是校长应具备的最重要的两种能力。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是校长义不容辞的责任，此次调查数据显示，来自校长的教学反馈占教师得到的所有教学反馈的40%以上。校长决定学校的发展方向，也是教师、学生的楷模，一个优秀的校长需要具备以下能力：开展课程建设，引领课堂教学，处理学校日常事务，自我提升，思考并撰写工作计划和总结，与师生、家长沟通交流，规划学校发展，维系公共关系等。校长在引领学校发展，促进学校中人的发展、塑造核心思想和观念中起到引领作用。<sup>[[xlviii]]</sup>调查数据表明，中国校长具有较高等能力，能够胜任校长工作。92%的受访校长表示对他们作为校长所做的工作表示满意，相比之下，只有8%的校长对自己的工作不满意。

#### 3. 奉献的精神

虽然校长的个性特征千差万别，但中国校长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充满了对教育的奉

献精神，校长为学校发展奉献出了自己的时间、感情甚至金钱。调查表明，95%以上的校长表示每天都很忙，近87%的校长每天工作8个小时以上，绝大多数校长都要在周末或者节假日加班。校长还需要关注教师的发展和学生的成长。在促进教师专业成长、培养学生的过程中需要投入较多的个人情感。“一切为了学生，一切为了学校”是大多数校长的座右铭。校长致力于营造灵活、和谐充满人文精神的环境，在此过程中会获得成就感和满足感。此外，争取到更多的资源改善学校办学条件是校长在新时期面临的重要挑战。筹投资是吸引外部资源最重要的途径，在市场经济时代，校长不断采取多种措施为学校争取到更多的投资。在教育资源短缺的农村地区，很多校长甚至捐出自己微博的收入确保学校的正常运转。校长将奉献视为一种美德，研究数据表明，如果还有一次职业选择的机会，70%的校长仍然会选择坚守校长岗位。

#### 4. 自我的挑战

由于机会稀缺，竞争激烈，在现行中国校长遴选机制中，只有特别优秀的人才能当选。与普通教师相比，校长应具备创新精神和自我挑战精神。所谓教而优则“仕”，校长往往是教学中的佼佼者，优秀的教学能力是校长应具备的基本能力。除此之外，校长还具备卓越的管理才能。有些校长由于自身具备的以上优秀品质得到了领导的赏识而被提拔为校长。校长候选人在职业发展和研究中积累的实践智慧是校长选拔和校长任命的主要参照指标。保持与外界的联系，争取外部资源以促进学校发展客观上需要创新型领导。近年来，为提升办学质量，中国学校采取了多种改革措施，教育理念也随之发生了改变，学生为中心的教学实践促使学校实施创新型领导，在不断变化的内外部环境中，校长需要迎接多方挑战。

#### 5. 危险的职业

此项调查显示，82%的校长认为校长这一职业的优点大于缺点，实际上，校长是一个危险的职业。由于长期高负荷的脑力和体力劳动，较少的闲暇时间，加之升学压力，校长心理负担极重，往往疾病缠身。另一方面，作为学校的第一责任人，在事关学校发展的一些改革中容易触犯道德标准和法律规范。<sup>[[xlviii]]</sup>校长全面负责学校中的一切事务，需要时刻以较高的道德水准和严格的法律标准约束自己。面对巨大的工作压力，55%的校长表示自己后悔做校长。因此，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校长权责机制确保校长积极投入到学校改革之中。

### （六）学校组织的进化与变异

学校是由一群由特定目的聚集在一起的人组成的一个组织。<sup>[[xlix]]</sup>在当代，中国学校组织经历和进化和变异，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

#### 1. 设施设备现代化

近年来，中国经济愈加繁荣，政府扩大了教育投资，学校得以全面改进教学设施和设备。教学设施设备的现代化是教育现代化的基础。校园网络系统、多媒体计算机网络教室、师生电子阅览室、音体美等专用教学功能室、校园电视台、微格教室等，教室配备多媒体教学设备、覆盖无线网络等现代教学设施在中国学校中得到广泛应用，且教育机器人、虚拟现实 (Virtual Reality) 技术逐步走进学校教学和课堂中。调查数据显示，29%的学校拥有50台以上可以用于教学的电脑，受访学校的图书馆的平均藏书量为399976本，70%的学校藏书量在5000本以上。此外，学校中专业教室的平均数量为



13个, 承载了体育、音乐、美术等多达42种不同的教学功能。然而, 教学设施设备的现代化会将学校置身于依赖“信息技术神话”的悖论, 即学校乐观地相信技术能够解决一切教育问题, 追求最新的技术, 导致投入过多的资金, 造成教育经费的浪费。

## 2. 空间结构时尚化

相比于传统学校空间结构设计的形式、布局、功能单一的局限性, 现代学校的设计更加“时尚化”, 学校建筑的外部空间设计凸显文化感、科学化和审美性。学校建筑设计的创新需要体现学校的文化个性, 学校教育理念的变化是学校建筑和景观的变化的根本原因。新课程改革之后, 学校教育从死记硬背的教学模式转变为基于学生的积极参与、探究式学习、直接经验、问题解决、沟通和合作的教学模式。教学模式变革需要教学空间做出相应的调整。例如, 中关村第三小学的教学空间设计较好地印证了中国学校空间结构时尚化的变革。中关村第三小学位于北京充满创新和创造精神的“中国硅谷”- 中关村, 是教育创新的先锋。受到最前沿的教育理念的影响, 为方便教学实施多种组织形式, 中关村第三小学采用“校中校”和“班组群”的教学空间设计理念。以上教学空间结构能够使教学、学习、活动、游戏、交往、生活深刻地融为一体, 促进了学校的现代化。

## 3. 组织结构集团化

面对着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与供给突出矛盾, 中国在2010年之后出台了多项教育政策促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促进教育均衡发展的集团化办学政策在北京、上海、浙江等经济发达地区试行实施, 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进而在推广到中国的其它地区。教育集团化办学将提高优质教育资源供给和教育治理模式创新结合在一起, 其目的是在促进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公平发展的同时, 推进区域教育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名校办分校, 名校承办弱校以及中学、小学以及幼儿园两两打通是集团化办学的主要组织形式。

然而, 集团化办学在实践中也遭受到了冲击。一些学校被合并后, 办学规模急剧扩大, 对校长管理大规模学校的能力提出了巨大的挑战。集团化办学在确保学校教育质量的同时加剧了教育不平等, 也带来了诸如名校产生“牛奶稀释”、普通校掩盖教育问题并贴标签等诸多的矛盾。

## 4. 学校功能万能化

早在20世纪80年代, 邓小平就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发展战略, 教育是促进国家现代化的主要动力,<sup>[11]</sup>高质量、公平的教育是满足社会发展、提高劳动力质量的现实需求。教与学是学校组织的主要功能。对社会而言, 学校提供教育服务, 并起到促进阶层流动的作用。此外, 教育承载家庭使命, 起到培养人, 促进人的发展, 保存文化和更新文化等诸多功能。然而, 教育最大的功能莫过于帮助人们形成自由的品格并创造性地参与到社会生活之中。<sup>[12]</sup>因此, 学校需要依据教育目的综合考虑学校应发挥的实然功能和应然功能。

## 5. 地理分布集聚化

中国学校地理分布的矛盾在于不能兼顾教育公平和教育质量。地理空间集聚化意味着农村学校减少, 城镇学校增多。随着城镇化的推进, 人口结构的变化, 中国加大了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的力度, 在20世纪90年代实行撤点并校政策, 乡村学校撤销或并入高

一级学校。撤点并校政策遭受到人们的质疑，主要是该政策的实施导致农村地区学校逐渐减少，并致使部分农村学生上学困难。撤点并校政策的另一个目的是利用中心校的优质资源提高农村学生的受教育质量。撤点并校政策还起到了减少教育支出，加快城镇化进程，提升教育质量的目的是。<sup>[[ii]]</sup> 城镇学校规模不断扩大，“巨型学校”纷纷出现。学校集聚城镇的分布有效改善了农村教育资源配置，在提高义务教育质量和培养人才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巨型学校”也为学校带来了过度负债经营、规模不经济、学校发展不均衡等新的问题。

## 五、结语

中国政府一方面加大教育投入，另一方面加强对教育的监管，中国教育的管理体制从中央集权模式逐步转变为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和学校“三位一体”的管理模式，并将教育现代化作为核心关切。中国学校拥有了更多的自主权，并不断探寻新的治理策略。中国教育中文化传统和现代理念的交互作用是解释中国学校充满冲突和辩证关系的核心原因。

随着中国社会和人口政策的变迁，学龄儿童数量不断减少，学校更加关注保护学生的学习兴趣。因此，学生对学校教育的满意度不断增强。长久以来，考试一直是中国教育的“指挥棒”，但现在这种状况正在发生转变。为了满足学生多样化的学习需求，学校不断增设新的学习内容，优化课程，并促进考试评价多元化改革。教学也演化成为专业化程度特别高的职业。教师职业中较高的入职标准是确保高质量教育的基本保障，教师在其职业发展的不同阶段都开展持续专业发展活动。为了提升学校的教学质量，学校对教师采取了十分严格的评价方式。融合新科技的全面教学改革是形塑现代学校教育的新生力量，学生学习方式向教师指导下的探究学习转变。中国教育取得了显著成就，并表现出了充满活力而又色彩斑斓的发展图景。从辩证的视角来看，中国学校充满了矛盾和冲突。教育改革的步伐还在继续，在全球化时代，中国也期待更多深度的教育国际合作。

<sup>[1]</sup> 本研究的中国学校指中国的小学和中学，包括小学、初中和高中三个阶段的学校教育。

<sup>[[i]]</sup> Gu M., Ma, J., & Teng, J. (2016) *Portraits of Chinese School*. 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

<sup>[[ii]]</sup> Ball, R. A. (1979) The Dialectical Method: Its Application to Social Theory. *Social Forces*, 57(3), 785-798.

<sup>[[iii]]</sup> Rytina, J. H., & Loomis, C. P. (1970) Marxist Dialectic and Pragmatism: Power as Knowledg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5(2), 308-318.

<sup>[[iv]]</sup> Rescher, N. (1977) *Dialectics: a controversy-oriented approach to the theory of knowledg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sup>[[v]]</sup> Truscott, D. M., Swars, S., Smith, S., Thornton-Reid, F., Zhao, Y., Dooley, C. & Matthews, M. (2010) A cross-disciplinary examination of the prevalence of mixed methods in educational research: 1995-2005.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Research Methodology*, 13(4), 317-328.

<sup>[[vi]]</sup> Onwuegbuzie, A. and Teddlie, C. (2003) A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data in mixed

- methods research. in A. Tashakkori and C. Teddlie (eds), *Handbook of Mixed Methods in Social and Behavioral Research*, 351–383, Thousand Oaks, CA: Sage.
- [[vii]] Wu, Q., Zhang, X., & Waley, P. (2016) Jiaoyufication: When gentrification goes to school in the Chinese inner city. *Urban Studies* (Sage Publications, Ltd.), 53(16), 3510-3526.
- [[viii]] Cohen, L., Manion, L. & Morrison, K. (2000) *Research methods in education*. London: Routledge Falmer.
- [[ix]] Denzin, N.K. & Lincoln, Y.S. (2000)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Thousand Oaks,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 [[x]] Merriam, S. B. (2015) *Qualitative research: A guide to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San Francisco, CA: Jossey-Bass.
- [[xi]] Merriam, S. B. (2015) *Qualitative research: A guide to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San Francisco, CA: Jossey-Bass.
- [[xii]] Taylor, S. J. (2015) *Introduction to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A guidebook and resource*. New York: Wiley.
- [[xiii]] Putten, J.V. & Nolen, A.L. (2010) Comparing Results from Constant Comparative and Computer Software Methods: A Reflection About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Journal of Ethnographic & Qualitative Research*, 5(2), 99-112.
- [[xiv]] LeCompte, M. D. (2010) *Designing & conducting ethnographic research: An introduction*. Lanham, Maryland: Alta Mira Press.
- [[xv]] Fereday, J & Muir-Cochrane, E. (2006) Demonstrating Rigor Using Thematic Analysis: A Hybrid Approach of Inductive and Deductive Coding and Theme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ative Methods*, 5(1):80-92.
- [[xvi]] Miles, M. B., & Huberman, A. M. (1994)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an expanded sourcebook*.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 [[xvii]] Creswell, J.W. and Miller, D.L. (2000) Determining Validity in qualitative inquiry. *Theory Into Practice*, 39 (3), 124-130.
- [[xviii]] Amankwaa, L. (2016) Creating Protocols for Trustworthines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Journal of Cultural Diversity*, 23(3), 121-127.
- [[xix]] Putten, J.V. & Nolen, A.L. (2010) Comparing Results from Constant Comparative and Computer Software Methods: A Reflection About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Journal of Ethnographic & Qualitative Research*, 5(2), 99-112.
- [[xx]] Marples, R. (2012) *Aims of Education*. Hoboken: Taylor and Francis.
- [[xxi]] Zou Guang-Wei. (1985) China's educational aim and theory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ducation* 31: 189.
- [[xxii]] Prus, R. (2011) Examining Community Life 'in the Making': Emile Durkheim's Moral Education. *American Sociologist*, 42(1), 56-111.
- [[xxiii]] 马健生,饶舒琪.非想象共同体中的集体认同培养——中国学校的使命[J].*教育科学*,2016(3):1-5.
- [[xxiv]] Zou G-W. (1985) China's educational aim and theory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ducation* 31: 189.
- [[xxv]] Holmes, G., & Hooper, N. (2000) Core competence and education. *Higher Education*, 40(3), 247-258.

- [[xxvi]] Andrew, J. R., Daniel, T. W. (2010) "21st-Century" Skills: Not New, but a Worthy Challenge, *American Educator*, 2010 (n.d.). Retrieved January 25, 2017, from <http://eric.ed.gov/?id=EJ889143>.
- [[xxvii]] Zhang, Y. Y. (2014) *The source of innovation in China: highly innovative systems*. Houndsmills, Basingstoke,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
- [[xxviii]] 顾明远,教育大辞典[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06):13.
- [[xxix]] Ministry of Education (2015) *Annals of Statistics*. retrieved from <http://www.gov.cn/xinwen/2016-07/06/content-5088866.htm>.2016-07-06.
- [[xxx]] Lomas, L. (2002). Does the Development of Mass Education Necessarily Mean the End of Quality? *Quality in Higher Education*, 8(1), 71-79.
- [[xxxi]] Yi-Lin, C. (2014). Grooming the New Elites: Cultural Capital and Educational Strategies in Urban China. *Conference Papers --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1-38.
- [[xxxii]] Zhou, X, Tuma, N.B., and Moen, P. (1996) Stratification Dynamics under State Socialism: The Case of Urban China, 1949-1993. *Social Forces* 74 (3): 759-796.
- [[xxxiii]] Ministry of Education (1999)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 (in Chinese). Retrieved from <http://www.MinistryofEducation.edu.cn/publicfiles/177/200407/2478.html>.
- [[xxxiv]] Baomin, Z. (1997) Reforming educational assessment and encouraging all-round development. *Chinese Education & Society*, 30(6), 55.
- [[xxxv]] Zhu, M. (1999) The views and involvement of Chinese parents in their children's education. *Prospects*, 29(2), 233-238.
- [[xxxvi]] Kajanus, A. (2015) *Chinese student migration, gender and family*. Houndsmills, Basingstoke,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
- [[xxxvii]] 中国父母普遍对孩子抱有较高的学历期待. 新华网 [EB/OL].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9-03/29/content\\_11095051.htm](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9-03/29/content_11095051.htm).2009-3-29.
- [[xxxviii]] Hayhoe, R. (2006) *Portraits of influential Chinese educators*. Hong Kong, China: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search Centre,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xxxix]] Lewin and Hui
- [[xl]] Comer, J. (2015) Developing Social Capital in Schools. *Society*, 52(3), 225-231.
- [[xli]] Wu, Q., Zhang, X., & Waley, P. (2016). Jiaoyufication: When gentrification goes to school in the Chinese inner city. *Urban Studies* (Sage Publications, Ltd.), 53(16), 3510-3526.
- [[xlii]] Ministry of Education (2015).201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retrieved from [http://www.MinistryofEducation.edu.cn/srcsite/A03/s180/MinistryofEducation\\_633/201607/t20160706\\_270976.html](http://www.MinistryofEducation.edu.cn/srcsite/A03/s180/MinistryofEducation_633/201607/t20160706_270976.html).2016-07-06.
- [[xliii]] Vavrus, F., & Bartlett, L. (2013) *Teaching in tension: International pedagogies, national policies, and teachers' practices in Tanzania*. Rotterdam: Sense Publishers.
- [[xliv]] Wolcott, H. F. (1973) *The man in the principal's office; an ethnography*.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 [[xlv]] Wolcott, H. F. (1973) *The man in the principal's office; an ethnography*.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 [[xlvi]] Ministry of Education. (2013) The professional standards of principals of the compulsory education stage (in Chinese). Retrieved from <http://www.moe.edu.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7148/201302/147899.html>. 2013—2-16;  
[http://www.moe.edu.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7148/201302/xxgk\\_147899.html](http://www.moe.edu.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7148/201302/xxgk_147899.html)
- [[xlvii]] Hu, R. (2010). School principals in Mainland China core leadership practices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 [[xlviii]] Gu, M. (2013) Cultural Foundations of Chinese Education. Leiden: BRILL.
- [[xlix]] Brunold, A. (2013) School and Community Interactions: interface for political and civic education. Wiesbaden: Springer VS.
- [[l]] Hartnett, R. A. (1998) The saga of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from the Tongzhi Restoration to Tiananmen Square: revolution and reform. Lewiston, NY: E. Mellen Press
- [[li]] Goodlad, J. I. (1984) A place called school: prospects for the future. New York: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 [[lii]] Mei, H., Jiang, Q., Xiang, Y., & Song, X. (2015). School Consolidation: Whither China's Rural Education? *Asian Social Work & Policy Review*, 9(2), 138-150.